

排布各专业管道。施工时到现场查看，吊顶内塞满管道，施工难度可想而知，设计人员有时也真是无奈。

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

我在各设计院工作期间一直都是技术负责人，也一直工作在设计一线。我坚持每天坐班工作到75岁多，直到2017年老伴身体欠佳，才辞去退休后的聘任工作，之

后在家，计算机网上作业零星审图。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向母校报告，但在平凡岗位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，我做到了！再回到美丽的清华园，大礼堂依旧，二校门、二教依旧……看着背着书包的学子匆匆而过，那不就是曾经的我们吗！属于我们的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感慨岁月如梭啊！祝愿母校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越来越好！

本科期间亲历的几件“大事”

○李 军（1980级自动化）

1980级入学时，新生1956名，录取到13个院系（毕业时调整为18个院系），共66个班级。我们经历了两任校长、三任书记：入学时的校长刘达于1983年5月成为名誉校长，签署我们毕业证书的校长是高景德；入学时的校党委书记也是刘达，1982年7月至1984年2月是林克，之后是李传信。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，是我们青春飞扬的时光。在那些举国奋发向上的日子里，零字班有很多难忘的经历：

1980年的竞选

清华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80年代也热闹起来。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校更受关注的，其实是区县人民代表选举。我那时就和同学去北大，听过当年的风云人物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公开演讲和辩论。有资料记载，当时北京有17所院校近百名学生参加了竞选，其中11人当选。清华的情况有些特殊，虽然也有十余名学生参加人民代表竞选，而且顾立基成功当选，但清华的选情热度始终在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上，

因为按照惯例，那一届新当选的清华学生会主席，将成为全国学联主席。

林炎志并非最早站出来竞选学生会主席的，然而一朝出马，便以接地气作风和雄辩口才而大杀四方，也因此成为众望所归。当时自动化系新生的男生宿舍在二楼西侧，上课和自习都经常经过北院的布告栏。有天，看到不少人围观上面的竞选张贴，原来是关于林炎志的一些争议。那时我们并不懂竞选中的各种争议，但宿舍里几个人都觉得民主选举中不应人身攻击，便由我起草、林健永书写，以“部分新生”或类似的名义贴了回应。

那时不懂“政治”，后来林炎志多次讲过他的竞选活动是在学校党委直接领导下展开的。当年的学生部部长王凤生也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，谈到老校长蒋南翔对当年竞选的关注和指示，即“有领导地组织参加‘竞选’，用‘竞选’来引导‘竞选’”。选举前夜，学生会主席候选人“决赛”的一对一辩论在西阶举行，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学心知肚明，林炎志的号

召力已使竞选结局毫无悬念。1980年12月12日，他以压倒优势当选第21届清华学生会主席，并于次年当选全国学联主席。经历过清华竞选洗礼的林炎志和顾立基，后来都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，经受了历史考验。而这场空前绝后的竞选，也激发我们思考了很多大是大非，思想在激荡中日臻成熟。

我们这代人，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成长起来的。

1981 年的体育

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1981年4月举行的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囊括了全部7个冠军，创造了世乒赛的历史纪录。五四青年节那天下午，大礼堂前横幅热烈、彩旗飞舞、奖杯闪耀、情绪昂扬，学校近八千师生隆重欢迎国乒英雄凯旋归来。在兴高采烈的集会上，代表团团长徐寅生、副团长兼总教练李富荣、教练张燮林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。

徐寅生早就以“乒乓辩证法”闻名。1964年，时任国乒教练的徐寅生对中国女队所讲的“关于如何打乒乓球”获得毛泽东主席高度称赞——“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，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。”那天，我挤在人群中，听着徐寅生生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演讲，颇感名不虚传。不过，他在风趣地讲述国乒经历挫折、受到误解时，惟妙惟肖地模仿比赛现场观众，喊了一句“13号，臭大粪”，害得我好多天下午四点半去西操训练时，都不敢穿代表队的深蓝色运动服，因为我背上的号码恰好是13。

同年，学校里还发生两次因体育

而起的游行。一是10月18日中国男足以3:0大胜亚洲冠军科威特队；二是11月16日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，同学们喊着口号甚至举着火把，在校园内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。80年代初，中国“冲出亚洲、走向世界”的一个又一个突破，极大地增强了改革开放中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志气。

社会活力的迸发和民族自信的建立持续升温，并于1984年在中国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时达到一个高潮，对我们在大学期间积极进取的心态有很大激励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马约翰先生的“体育的迁移价值”理论：体育是大学培养完全人格的重要手段。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，不只限于运动场上，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。

五年大学生活中，我唯一没有间断的课外活动，就是在体育代表队参加投掷标枪的训练和比赛。从一个二三线“编外”学生运动员，在校运会上给系里争点荣誉，到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参加北京市高校比赛，我亲身体会了体育对德育和智育的积极影响、对个人和群体以至社会的迁



自动化系自仪 02 班毕业合影，后排右 2 为李军。
摄于 1985 年 7 月

移价值。我在硕士期间和留系担任青年教师期间，都投入了很大精力推动自动化系的学生体育运动。那些年，化工、无线电和后起之秀自动化、精仪等系，都是运动员最能拼、啦啦队最能喊、学生会最能干的系，也是“大系”中集体荣誉感最强、学生工作整体精神面貌最积极向上的系。

1982 年的宪法

虽然历经了1988年、1993年、1999年、2004年和2018年的五次修订，我国的现行宪法至今仍为1982年宪法，因为1975年和1978年宪法都没有实行超过5年，1982年宪法实际上是1954年第一部宪法（“五四宪法”）后的第二部长效宪法。

我对“八二宪法”记得比较清楚，是因为有次央视来清华拍摄大学生学习新宪法的新闻时我被拍到，不小心在新闻联播中“露了一把脸”。那是1982年底，因为我在校学生会分管宣传，当时已经担任校团委书记的林炎志，把我叫去一教，参加学习新宪法的座谈会。会上大家相继发言，散会后就各忙各的，并未在意这次“拍录像”与平时有所不同。

周末回家，父母说有亲戚打电话来，问上电视的是不是我？这才得知新闻联播用了我的一个镜头，似乎还有一两句“台词”。那时录像设备还很稀罕，网络传媒远未诞生，因而我自己反而从未见过这条新闻。当时感觉宪法离日常工作挺遥远，对宪法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，参加座谈能表达出来的无非只是一些字面的理解。全民对宪法的认知和重视，也是在那以后，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依法治国的长期演进而逐步提高。

这40年来，经历了中美两国学习工

作、创业投资和教学研究的体验和对比，越来越觉得依法治国的重要性。在一个优越的立法、执法和守法国度里，不但社会的摩擦系数更低，国家的内在稳定性和公民安定感也更强。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，需要有更高效的途径不断达成新的社会共识，并以法律修订的方式保障社会运转的与时俱进。目前看来，“八二宪法”功不可没。正是以它为根本大法，国家立法体系化和执法专业化都逐步提高，对社会稳定和进步至关重要。

1983 年的减负

第22届学生会，是在1982年9月24日的学生代表大会上经选举产生的，任期到1983年9月16日新一届学生会产生为止。在这届学生会工作期间，我们作为学生干部，在为同学们服务的社工锻炼中成长，也经受了一些考验，其中“3·5围困”事件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

一教是学校在当年经济条件下，“斥巨资”建立的第一个、也是当时独一无二的电化教学楼，每个教室都配有两台电视。学生会利用这个难得的优越条件，想方设法搞来录像带在周末播放，活跃课余生活、开阔文化视野。在那个普通家庭连黑白电视都尚未普及的年代，这些“内部电影”一票难求。作为学生会干部，我经常去帮助维持秩序，曾经见过学生手绘的乱真假票，当时想当然以为是建筑系同学干的，直到最近读了一篇回忆文章，才知道机械系也不乏才华横溢的同学……

1983年3月5日晚，计划播放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苏联老电影《围困》，有的同学下午四点就入场抢占有利地形。到放映前，一教的每个教室里都挤满了人，甚至

教学楼大门的门框和玻璃都被不小心挤坏了。教务处主管老师到场后，很生气，连说“不放了，不放了”。正当学生会主席宋军在放映室里与管理人员积极交涉时，同学们坐不住了，尽管我们一再解释、劝阻，还是有不少人聚集到楼道里喧哗，教室里也有人开始不耐烦地一齐跺脚，最激烈时感觉整个楼都开始共振。

那一天，是传统的学雷锋纪念日，结果我们为放映《围困》而反遭“围困”。很快，艾知生副校长就把学生会几位主席、副主席约到工字厅了解情况。他认真地和我们一起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。记得当时副主席王彦佳气场强大，“挥舞小手”一通输出，入情入理头头是道。最后艾知生副校长若有所思地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，然后总结说，看来学生学习负担太重，影响了全面发展。

没过几天，公告栏里贴出了学校的布告——所有课程削减10%的课时，立即生效。回想我在清华学习工作的30年里，在学期中调整教学安排是极端罕见的，只有遇到突发重大疫情这类事情时才会发生，所以这件事情现在想起还是很震撼的。虽然以前在关于22届学生会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件事，有些细节的记忆也不是那么准确，但我终身难忘的体会是确定的：学校领导是全心全意呵护学生全面成长的。

1984年的阅兵

毕业前一年，如果说校内公众关注的大事，建国35周年大阅兵必定是位居前列的。在这之前，上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还是在建国十周年的1959年。1984年这次十余万人参加的阅兵仪式，是国家和社会振奋而充满希望的欢庆大典。

走改革开放之路是全民的心声，但在过程中也会伴随争议。把一个如同巨轮的大国转向现代化的航程，是不会一帆风顺的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是真正的大智慧。

事实上，波动与曲折正是思想解放的必经之路。始于1983年10月下旬的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也是一例，它不但迅速在全国展开，而且波及的范围从思想理论战线蔓延开来到社会生活多个领域，到1984年初，终于告一段落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中，曾有老师好心提醒我要小心，因为一期由学生“文青”精心编辑的铅印版《清华文学》清样，已经摆在领导的桌上，画满了红红绿绿的道道。我甚至想过，如果自己像“右派”那样被抓出来会怎么样。运动很快偃旗息鼓，不过那本铅印刊物始终未曾印刷。

正是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的戛然而止，让社会活力得以继续释放、经济建设得以健康发展，人们收紧的心情再次放松下来。那一年，阅兵后是国庆游行，最早是按惯例练习踢正步的，但临行前又取消了齐步要求；北大同学还自发打出了“小平您好”的标语，社会气氛一派轻快活跃。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联欢，我也和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了。大家都很快乐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上下一心、其利断金。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，至今回忆起来也令人感动。套句著名的电影台词，我想说：1984年过去几十年了，我很怀念它！

1985年的启航

1985年，我们毕业了。那时还没有直博，但有不少同学留在北京工作或读硕。自仪02这个班号的集体成为了历史，大家很是依依不舍。我们班曾经连续两年被

评为校级先进集体，还曾荣获北京市先进集体称号。这些成就首先要归功于班主任孙之荣老师和辅导员焦宝文老师。刚上大学时，我们还在“叛逆期”，大家血气方刚，多少觉得孙老师的细致关心显得有点婆婆妈妈。但多年后，我们每次聚会还是尽量选择校园附近，以便请孙老师参加，说明内心还是非常认可他的热忱关爱和真挚引导。孙老师戴眼镜、操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颇有学究气质，在专业方向上也富有远见和勇气。他送我们毕业后就转入新复建的生物系，成为生物信息学的大教授。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，孙老师一直是以身作则、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榜样。

我们班集体很团结，大家的感情也很深，这不仅从当年各项活动中可以看出来，毕业40年来持续的互助和相聚更是例证。这与当时学校重视班集体建设的文化有关，也与班里的一些做法有关。

大学五年里，除了刚进校时很短的过渡期，我们班男生一直住在11号楼一层，两间向阳的南房、两间北房。最初可能是为公平起见，班里做了南北宿舍的调整，但并不是简单南北对换，而是打乱了编排，后来大概是发现这个做法好处良多，



最近十几年来，同班同学每年两次春秋游，从未间断。右3为李军

就变成了定期调换，所以我几乎和班里所有男同学都曾为室友。这样一来，自然大家都相互了解较深，也没有小圈子。高年级时，班里还经历了一次持续数天的交心活动，有时搞到很晚，敞开聊了入学以来的心理历程，大大加深了同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情。不求苟同，但求相知，正是“和而不同”。最近十几年来，同班同学每年两次春秋游，从未间断。

我们那一届，毕业分配赶上第一次双向选择。学校汇总需求，学生选报志愿，再由学校推荐，用人单位择优录用。毕业分配的松动给了大家更大的选择空间，已经觉得挺幸福的，但之后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带来的择业可能性，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想象。我粗略数了一下，全班34人中，有10人获得博士学位，另有10余人获得硕士学位，6人曾在国内高校工作，6人曾经或仍在创业，三分之二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生活过，还有多人曾在母校或校友会任职等。

1985年7月，零字班毕业时，还没有时兴穿学位服，我现在也完全没有毕业典礼的记忆，但到北京站送同学时热泪盈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那时，除了对同学和集体不舍，每个人也都有一种前途未卜的紧张和跃跃欲试的冲动。启航了，我们驶离清华的港湾，去乘风破浪。

时光荏苒，四十年很长，也很短。从入学时被竞选震撼，到毕业时忐忑不安，大学五年有压力、有沮丧，也有数次狂欢；有暗恋、有失恋，也有终成眷属。回首往事，想起我们的初心和选择，更能看清的是自己，更加珍惜的是集体。来日方长，有许多已渐模糊的往事要一起回忆，更有许多令人期待的未来要一起经历。